

# 澳門歷史文化領域中的非中文著作概況

Paul A. Van Dyke 劉嘯虎 譯

**[摘要]** 過去一百年來，有關澳門的研究和書寫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20世紀初期只有很少人對澳門這塊飛地進行研究，到現在每年都有大批學者進行大量的研究，以至無法跟上其進展步伐。顯然，史學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早期關注如何將城市作為葡萄牙殖民地進行管理的簡單想法，到後來對同時由葡萄牙和中國兩國政府控制的領土的更複雜和細微的解釋。此外，研究者也越來越多地使用多種語言（包括葡萄牙語，中文和英語）編寫的史料，以及澳門本地和線上的資料，這導致了近幾十年來研究的巨大擴展。本文也回顧了一些較為著名的澳門題材的葡萄牙語和英語出版物，並關注它們隨着時間推移而生的歷史發展。

**[關鍵詞]** 歷史學 澳門史 清史 葡萄牙史 中西交流

澳門的歷史著作涵蓋範圍廣泛，涉及多種語言。本文將葡萄牙文和英文撰寫的涉澳非中文著作作為研究對象，僅就從整體上對澳門這塊飛地（enclave）所進行的宏觀研究展開探討，而不涉及着眼於這座城市日常生活某些方面的微觀研究。目前中文史料的文獻體量龐大，有關這一問題筆者將另行撰文探討。<sup>①</sup>

歷史學者們都充分瞭解，歷史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研究中可供使用和實際使用的檔案文書。如果只接觸教會文書，則可以預見這一研究肯定是宗教性的敘事。如果研究者僅從某個政府部門獲取文獻，例如外交部或財政局，則可以預見這一研究所關注的必然是政治關係或經濟發展。因此，討論澳門早期歷史文獻之前，重點應指出：在1952年澳門總檔案館（Arquivo Geral de Macau）——1979年該館改名歷史檔案館（Arquivo Histórico），1986年又改為澳門檔案館（Arquivo de Macau）——成立以前，要獲得澳門史料是困難重重的。<sup>②</sup>

**作者簡介：**Paul A. Van Dyke（范岱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郵編 510275；劉嘯虎，湘潭大學碧泉書院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郵編 411105

① 就澳門原始史料的概況而言，筆者建議讀者參閱《澳門研究》雜誌正在連載的系列文章〈澳門學著作提要〉，該系列從2010年總第56期一直連載至今。

② <http://www.archives.gov.mo/pt/content/?id=history>, accessed 2018.10.17.

## 一、澳門早期檔案記錄的保存

1952年以前，澳葡政府各部門保存檔案文書各自有各自的途徑。一些文書都是裝進文件盒並塞到文件櫃裏，另一些則以更系統、更容易查閱的方式保存，而這樣就可以查找到特定年份的檔案記錄，無需翻遍幾十個文件盒。<sup>①</sup> 應該保存哪些文書？或者如何收藏保存這些文書？政府各部門之間並沒有統一的標準。結果隨着時間的推移，隨便哪個部門都能自行決定清理文書——將成箱的檔案記錄處理掉，給其他東西騰地方——許多文書就這樣憑空消失了。澳門的許多教會檔案也是如此，各個教區都按自己的傳統保存或丟棄檔案記錄。中文文獻記錄的清理尤甚，這就解釋了為甚麼僅有如此之少的中文文獻保留下來。

當時也沒有統一的慣例允許外來研究者訪問和查閱特定部門的檔案記錄。歷史學者可以提出查閱要求，但是否會得到批准則要視乎當時的部門負責人而定。此外，許多文書只存放在文件盒內，沒有內容摘要也沒有索引，翻查一遍非常耗時，而且到頭來可能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資訊。

1929年，澳葡政府開始對澳門歷史上的重要文獻進行編纂和出版，冠名為《澳門檔案》（*Arquivo de Macau*）叢刊。第一輯於當年6月出版，此後每月出版一輯，每期轉錄刊佈的文獻越來越多。該叢刊中的檔案記錄並非按照時間順序刊佈，而是隨機選擇的。例如在第一輯中，刊佈的文獻從17世紀到19世紀都有。後面的多卷均是如此。因此，需要查閱索引才能找到特定年份的文獻。

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因而《澳門檔案》第一系列和第二系列之間出現斷檔。從1931年8月到1940年12月，《澳門檔案》停刊。1941年12月《澳門檔案》第二系列重新開始出版，旋即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中斷。1942年1月至1964年1月，《澳門檔案》再度停刊。《澳門檔案》第三系列於1964年2月復刊，一直出版到1979年1月停刊。顯然，20世紀40年代的歷史書寫跟80年代的歷史書寫大不相同，簡單來說原因就在於彼時能接觸到的史料僅限於《澳門檔案》。

許多1952年之前研究澳門的歷史學者，例如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徐薩斯（裘昔司，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白樂嘉（Jack Braga）以及文德泉神父（Father Manuel Teixeira），他們只能接觸到一些經過揀選的檔案文獻。即便如此，許多這樣的檔案文獻後來還被丟棄或銷毀了。在那些年裏，要獲取果阿或葡萄牙文獻的唯一方法，就是親赴當地。雖然這些早期的歷史學者能查閱到今天已經不存在的檔案記錄，但受當時能接觸到的文書所局限，他們的研究範圍也是有限的。

博克塞（謨區查，Charles Boxer）設法克服了這些障礙。他有足夠的時間和財力親赴檔案文獻所在地，還自費購置了一批其他研究者無法接觸到的手稿。憑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語言能力，博克塞有效彌合了葡萄牙文、英文、荷蘭文和日文之間鴻溝，就澳門及其在東亞歷史中的作用提出了更為公正的觀點，由此成為了其中一位先驅式的人物。當然，葡萄牙與荷蘭的學者可以自由運用羅曼語言（Romance languages）的原始史料，但是他們中許多人往往無法駕馭用英文和日本書寫的文獻。中國和日本的學者可以研究他們的母語史料，但是囿於財力和技術，他們往往無法瀏覽歐洲的文獻。如此，史料的獲取和使用史料的能力限制了研究，並在某種意義上預定了研究

<sup>①</sup> 筆者在本段落中探討的大部分內容，來自於從前筆者與歷史學家施其樂牧師（Rev. Dr. Carl T. Smith）的大量對話交流。文德泉神父（Father Teixeira）及其他長期從事澳門研究的學者也對這一問題有所涉及。

的最終結果。雖然博克塞對無法閱讀中文史料深感遺憾，但他還是將研究範圍遠擴大到了前人未所能及的範圍（見下文）。

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一些研究沒有寫明史料的來源，例如文德泉神父的很多著作便是如此。<sup>①</sup> 在早年的研究中，筆者對這種做法甚為挑剔。然而，後來施其樂牧師（Rev. Dr. Carl T. Smith）向筆者指出，這些史料中有許多根本無法準確引用。舉例而言，翻找塞在文件櫃裏的十幾個文件盒，會發現盒上根本沒有名字，文獻也沒有系統的歸檔編排，所能做的就是列舉文書的類型、標題（如果能找到）、日期（如果有標記）以及責任人（如果能查到）。大量文書沒有包含這些資訊，或者只有其中一兩項可供識別的要素。

有的作者可能會提到某個文件櫃裏有某個文件盒，但是並不能保證那些文書會一直留在那個位置供下一位研究者查找。檔案文獻不時被移動，其中許多最終遭到丟棄或銷毀。因此正如施其樂牧師向筆者指出的那樣，對於存放在澳門各個地點的大量此類檔案文獻而言，想要拿出一種正規和一致的文獻引用方法並非易事。

面對如此複雜散亂的文獻保存情況，作者不把心思浪費在史料引用和來源參考上，也許並不奇怪。施其樂牧師認為，缺乏引用可能更多是由檔案文書保存途徑的混亂所導致，不見得是作者疏忽大意的結果。<sup>②</sup> 而且這些文書中很多現在已經消失了，所以對其內容的唯一記錄就是文德泉神父及其他人的著作。因此我們應該適當地感謝他們在摘錄資料方面所作的細緻工作。

許多澳門相關的文獻都是在葡萄牙和果阿寫就。還有一些是在澳門本地完成，然後被送往上述地方，至今仍在那裏保存。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和“漢文文書”彙集（Chapas Sinicas）正是兩個這樣的集成，目前都保存在葡萄牙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Torre do Tombo in Portugal，即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其他一些澳門相關文書則保存在果阿歷史檔案館（Arquivo Histórico de Goa）。還有許多有關澳門的中文文書保存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檔案館裏，從前歷史學者不一定能接觸得到。從1990年到2010年，大部分中文檔案文獻都得到出版。而在此之前，研究者必須親自去中國的檔案館查閱，而且還不一定能得到批准。

目前，澳門檔案館中有大量來自果阿、葡萄牙和中國的檔案文書複本。到2010年左右，這些在澳門都已經可以查閱。這些檔案文獻中的許多部分，還有歐洲和其他一些與澳門有關地方的教會檔案，現在都已經實現數位化，可以在線上獲取。因此在考察有關澳門的歷史研究時，必須認識到：許多作者的研究範圍僅限於其能獲得的文獻。這意味着研究者方法、關注點和論據的改變，可能是部分檔案記錄此隱彼現所帶來的結果，而不是外部影響或史學新思潮的作用。顯然，意識形態在歷史書寫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分析歷史時，許多因素都要考慮進去。

<sup>①</sup> 文德泉神父的著作一覽表可參見：Biblioteca Central de Macau (ed.), *Catálogo da Bibliografia do Monsenhor Manuel Teixeira Coleccionada Pela Biblioteca Central de 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e Biblioteca Central de Macau, 2004.

<sup>②</sup> 就引用文獻的困難而言，可以舉龍思泰在19世紀20年代用來撰寫專著的史料列表為例。他只是將史料簡單分為“原稿”（authentic manuscript）、“私人手札”（private manuscript notices）、“評議會檔”（commentarios）、“檔案文書原件”（authentic documents）等。見Anders Ljungstedt（龍思泰），*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早期澳門史——在華葡萄牙居留地及羅馬天主教佈道團簡史》，以下簡稱*An Historical Sketch*），Boston: James Munroe and Co., 1836; reprint, Hong Kong: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 1992一書中由文德泉神父（Fr. Manuel Teixeira）撰寫的〈前言〉（Foreward）結尾。

## 二、澳門研究的歷史著作

澳門最早的歷史著作之一，是1832年由瑞典駐華領事、長居澳門的龍思泰用英文所撰寫的《早期澳門史——在華葡萄牙居留地及羅馬天主教佈道團簡史》（*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目前已有瑞典文和中文版本。1990年，文德泉神父盛讚龍思泰是“澳門第一位歷史學家”，<sup>①</sup> 而若說誰是人盡皆知的第一位澳門歷史學家，則非文德泉神父本人莫屬。

龍思泰與薩賴瓦（Dom Joaquim de Sousa Saraiva）是好友，後者於1804年以“德博維助理主教”（*coadjutor bishop of Dom Alexander de Boveis*）的身份來到澳門。薩賴瓦本是北京主教，但由於清朝官員和教會領袖及傳教士之間關係不睦，他無法前往北京就職，只能留在澳門，擔任聖若瑟神學院（*St. Joseph's Seminary*）教授。薩賴瓦讓龍思泰接觸到了澳門的教會和政府檔案文獻，使其得以撰寫澳門歷史。正如文德泉神父指出的那樣，龍思泰使用過的許多文獻早已不復存在，這讓他的書更加重要。<sup>②</sup>

“葡萄牙人從未獲得過澳門的主權，儘管他們已經擁有澳門近三個世紀”。龍思泰也許是第一位提出這一觀點的外國學者。這一論調自有爭議，經常招致大批葡萄牙學者的斷然反駁。這些葡萄牙學者堅決維護自己的論點：澳門是一塊葡萄牙殖民地，僅屬於葡萄牙。他們拿出來支撐這一論點的一個關鍵要素，即早期的葡萄牙定居者如果沒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權，就不會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大興土木。

自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以來，許多研究都表明澳門這座城市在其歷史上大部分時間實際上都歸駐廣州的廣東巡撫管轄。這證明近200年前龍思泰的觀點是正確的。龍思泰還提出，中國官府正式允許葡萄牙人定居澳門是在1557年。這一觀點很大程度上已經為後世的學者所廣泛接受。<sup>③</sup>

龍思泰所接觸的大部分檔案文獻，都是由權威人士所提供。因此他顯然必須按照當地的法律規定，遵循官方的檔案記錄。從龍思泰所處的時代到21世紀初，人們一般都認為：歷史上澳門禁止其他外國人居住，直到1757年澳門議事會（*Senate*）才通過法令，授予非葡萄牙公民臨時居留權。據推測，這是在中國官府的壓力之下實現的。中國官府規定澳門必須接納所有來此從事貿易的人，而不論其宗教信仰、國籍和種族。<sup>④</sup> 不過近年來有研究顯示，這種對歷史自上而下的理解是錯誤的。因為遲至從1684年開放對華貿易起，幾乎每一年都有非葡萄牙人在澳門居住。1757年批准臨時居留權的法案，只是將現實中早已普遍的情況合法化。到19世紀初，大批非葡萄牙公民獲准在澳門永久定居。<sup>⑤</sup>

①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Summary of Speech to the Swedish History Delegation in Macao, 27 March 1990”, by Fr. Manuel Teixeira.

②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Foreword”, by Fr. Manuel Teixeira.

③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p. 9.

④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p. 29.

⑤ 有關1757年之前非葡萄牙居民在澳門居住的情況，可參見：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Reprint, 2007, p. 13; Carl T. Smith and Paul A. Van Dyke, “Armenian Footprints in Macau,”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8 (October 2003), pp. 20-39. 而18世紀末19世紀初非葡萄牙居民在澳門長期定居的情況，可參見：Carl T. Smith and Paul A. Van Dyke, “Musli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1700 to 1930,”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10 (April 2004), pp. 6-15. 龍思泰與英國著名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19世紀初也長期定居於澳門，最終兩人都在澳門逝世。



1867年，桑帕約（Manuel de Castro Sampaio）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葡萄牙文專著《澳門的華人》（*Os Chins de Macao*）。後來該書由馬丁斯（Rufino Martins）譯為英文，又於1877年以《澳門華人的風俗習慣》（*Manners & Customs of the Chinese at Macao*）之名出版。<sup>①</sup>這或許是第一本探討澳門華人生活與習俗的嚴肅學術著作，但該書更像是一部口述史，因為沒有任何資料來源的引用，內容主要靠桑帕約的詢問和觀察。

1888年，法蘭薩（Bento da França）出版了《澳門史初探》（*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一書。<sup>②</sup>法蘭薩曾在澳門供職，其身份並非歷史學者，也不是學界中人。他出於自己的愛好對歷史進行整理匯編，沒有任何政治或其他目的，只是盡自己所能去講述澳門的故事。<sup>③</sup>

下一部有關澳門的嚴肅學術著作，是1902年徐薩斯撰寫的《歷史上的澳門》（*Historic Macao*）。<sup>④</sup>徐薩斯在香港出生長大，所以用英文書寫歷史。他大量引用龍思泰的著作，但卻深信“澳門被無條件割讓給了葡萄牙人”。這跟龍思泰的有限主權論針鋒相對。<sup>⑤</sup>徐薩斯宣稱，葡萄牙人獲得在澳門半島定居的權利，是其幫助中國打擊海盜的酬勞；葡萄牙人多年不用支付地租銀，該事實便足以證明這一點。徐薩斯還辯稱，葡萄牙人後來支付的地租銀不是合法的租金，而是被腐敗的中國官員索取的費用。這些腐敗的中國官員出於一己之私而巴不得壓榨葡萄牙人。<sup>⑥</sup>如前所述，近年來的研究並不贊同這一說法，而是傾向於站在龍思泰一邊。

徐薩斯指出，1573年半島地峽上修建起關閘（*Porta do Cerco*）之後，葡萄牙人只能通過每五天舉行一次的集市從中國人那裏獲得糧食補給。<sup>⑦</sup>葡萄牙人定居澳門初期，這一情況應該屬實。不過還有一個情況經常遭到忽視：關閘和葡萄牙人的屋舍之間有一片廣闊的可耕地，可以用來種糧食，飼養牲畜。此外，澳門半島南端的媽閣廟（*A-Ma Temple*）附近還住着一些中國漁民，彼時徐薩斯和其他歷史學者對此一無所知。這些早在葡萄牙時代之前就存在的華人定居點，直到最近才廣為人知。這即意味着如徐薩斯和後來的學者所描繪的那樣，中國官府通過供應糧食來嚴控葡萄牙人，該問題可能被誇大了。

當地的廣東漁民對澳門半島有各種各樣的稱呼，其中有兩個名字使用較多：一個是濠鏡（濠境、濠璟；*Hou Kiang*、*Hao Jing*），另一個是鏡湖（*Kiang Wu*、*Jing Hu*）。這進一步證明，那裏是中國人經常去捕魚和採集牡蠣的地方。所有這些中國人都是繞過關閘去澳門的。<sup>⑧</sup>當然，也沒有甚麼能阻止葡萄牙人自己捕魚種菜，而且他們還可以放養牲畜。所以，顯然不會如徐薩斯和其他學者所說的那樣，自集市購買乃是澳門唯一的糧食來源。

1926年，徐薩斯出版了該書的葡萄牙文新版。在一些補充的章節中，他對葡萄牙政府提出嚴厲批評。<sup>⑨</sup>這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徐薩斯指責葡萄牙不瞭解澳門的需求，建議降下葡萄牙國

① Manuel de Castro Sampaio, *Os Chins de Macao*, Hong Kong: Typographia de Noronha e Filhos, 1867; Rufino F. Martin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at Macao*, Shanghai: Celestial Empire Office, 1877.

② Bento da Franç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1888.

③ Franç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pp. 7-8.

④ Carlos August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imited, 1902.

⑤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p. 30.

⑥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p. 34.

⑦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p. 33.

⑧ 張復合等：《中國近代建築研究與保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84頁。

⑨ Carlos Augusta Montalto de Jesus, *Macau Histórico*, Macao: Portuguesa da Versão Apreendida, 1926.

旗，讓國際聯盟接管澳門。正如所料，這些言論在葡萄牙引起了軒然大波，對該書的抗議鋪天蓋地。不過在澳門，該書卻成為供歷史教學使用的標準教材，並於1990年被東方基金會（Fundação Oriente）再版重印。<sup>①</sup>

隨着時間的推移，學者們開始探尋果阿和葡萄牙的檔案記錄，以及歐洲的教會文獻。1949年，白樂嘉撰寫了一本小專著，題為《西方的先驅者及其發現澳門》（*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該書中白樂嘉使用了里斯本的檔案文獻，這是徐薩斯從前未曾涉及過的。這些檔案文獻證實，澳門的葡萄牙人定居點建立於1557年。白樂嘉同意徐薩斯的觀點，即除非葡萄牙人對這片土地擁有主權，否則殖民地不會建立。由此，白樂嘉反駁了龍思泰的有限主權論。<sup>②</sup>

下一個接着探討澳門問題以及澳門在亞洲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學者，正是博克塞。1948年，他出版了《葡萄牙貴族在遠東——澳門歷史中的事實與逸聞（1550—1770）》（*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一書。<sup>③</sup> 該書是一本文集，針對的是廣大普通讀者。博克塞自己在序言中也說：“本書不是一本歷史學著作。”<sup>④</sup> 儘管如此，該書記錄了澳門這座城市建立早期幾十年的歷史，敘述通俗易懂，堪稱是對澳門政治結構和澳葡政府的最佳概括介紹之一。其中〈自澳門駛來的大帆船〉（“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這一章，後來被擴充為一本同名著作。<sup>⑤</sup> 這兩本書一起記載了“加必丹末”（Captain-Majors）及後來的“總督”（Captain-General）制度，澳門就是處於這樣的制度管理之下。博克塞的書成為了後世歷史學者賴以解釋澳葡政府存在之初如何運作的基礎。《葡萄牙貴族在遠東》一書中，博克塞將1557—1849年這段時間的澳門總結為“由葡萄牙人管理但受中國影響強烈的混合體制”，<sup>⑥</sup> 對澳門這塊飛地是由葡萄牙單獨擁有、管理和控制的自治區這一觀念予以摒棄。

博克塞是最早詳細描述葡萄牙政府與亞洲天主教會關係的作者之一。《葡萄牙貴族在遠東》中有一章題為〈戰鬥的教會和商人〉（“The Church Militant and Mercantile”），介紹了天主教會和保教權（Padroado）在澳門經濟與政治中不可分割的作用。該書最後一章〈榮耀逝去〉（“Ichabod”）則記錄了耶穌會士遭驅逐的情況。博克塞後來將這些章節又擴展成一本大部頭的著作，名為《日本的基督教世紀（1549—1650）》（*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於1951年出版。<sup>⑦</sup> 該書研究的重點雖是日本，但澳門作為葡萄牙在東亞的宗教活動中心，仍在全書中得到廣泛探討。

① Carlos Augusta Montalto de Jesus, *Macau Histórico*, Macao: Portuguesa da Versão Apreendida, 1926. Reprint, Macao: Fundação Oriente, 1990.

② José (Jack) Maria Braga, *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 Macao: Imprensa Nacional, 1949.

③ Charles Ralph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④ Charles Ralph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x.

⑤ Charles Ralph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Lisbon: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63. Reprint, Macao: Macao Cultural Institute and Macao Maritime Study Center, 1988.

⑥ Charles Ralph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264.

⑦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1; reprint: 1967.

主要歸功於博克塞的影響和他對歷史學的廣闊視野，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澳門歷史研究基本上被“歐洲擴張”（European expansion）和“葡萄牙帝國”（Portuguese Empire）兩大主題所涵蓋。博克塞身處這一潮流的前沿，1965年出版了《荷蘭海洋帝國（1600—1800）》（*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緊接着四年後1969年又出版了《葡萄牙海洋帝國（1415—1825）》（*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sup>①</sup>雖然這些絕非首批研究歐洲列強的著作，但博克塞使用的大量多語種文獻有助於將學術探討往更具社會經濟性的敘事中擴展，突破了以往政治史學者自上而下的傳統研究方法。

彼時的學者無法接觸到中國的檔案，而歐洲的檔案記錄卻可以大量獲取。因此可以理解為甚麼許多學者跟風去研究歐洲的帝國史和擴張史。事實上，也有學者認為：由於大量資訊都保存在歐洲的史料中，所以第一步需要先完成對這些史料的研究，然後才能開始去理解這些歐洲史料與亞洲史料之間的交流互動。<sup>②</sup>

當然，將關注點全放在歐洲的擴張史和帝國史上，缺陷就是研究者只對那些跟歐洲人有交流互動的亞洲人感興趣，特別是關注皈依基督教的亞洲人，至於其他亞洲人就被排除在外，此即意味着這些研究算不上是真正的“亞洲史”。就澳門而言，研究的主角是葡萄牙人，與葡萄牙人交往互動的中國人只是次要的陪襯和邊緣的配角。長居本地但是跟葡萄牙人沒有交往互動的中國人，例如眾多的漁民家庭都被排除在探討的範圍之外。中國官員只有通過某些方式跟葡萄牙人交往互動的時候才是重要的，而對於他們在管理中國居民方面的活動，很少或根本不予探討。有批評家正確地指出，這種研究方法造就了一種精英的歷史，卻棄超過90%的澳門人口於不顧。

### 三、懷舊澳門

從1987年到1999年，一批著作紛紛出版，其目的只是簡單反思澳門何以成為如此迷人之地。在1987年澳門回歸大陸的談判中，圍繞這座城市的未來，必然會有不確定性存在。許多人感覺，有必要去直面澳門令人讚歎之處究竟何在。一旦搞清楚澳門的這些特質，就有可能找到一條途徑為子孫後代將這些方面保存下去。

① C. 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Penguin Group, 1965. Reprint, 1988;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London: London of Hutchinson, 1969.

② 關於歐洲帝國史和擴張史的部分研究，可參見：Vincent T. Harlow,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763-1793. Volume One: Discovery and Revolu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52; Vincent T. Harlow,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763-1793. Volume Two: New Continents and Changing Valu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64; J. H. Parry, *The Spanish Seaborne Empir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6; Holden Furber, *Europe and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Expansion, Volume II, 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6; Bailey W. Diffie and George D. Winius, *Found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58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James D. Tracy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 State Power and World Trade, 135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James D. Tracy (e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eprint, 1993; James C. Boyajian, *Portuguese Trade in Asia under the Habsburgs, 1580-1640*,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87年，東亞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sia，澳門大學前身）的郭理默教授（Rolf D. Cremer）將一系列有關澳門的英文文章結集出版，主題涵蓋廣泛。該書不是要對澳門歷史進行重新思考，而是對部分學者眼中澳門這座城市的優勢和突出特點進行概括。用郭理默自己的話來說，“本書不涉及政治問題”，而是“試圖以折衷的方式，用類似一塊一塊拼貼大型鑲嵌畫的方法，來解釋澳門的經濟和文化基礎”。<sup>①</sup>

1996年，柏群山（Jonathan Porter）出版了《想像之城：文化與社會，1557年至今》（*The Imaginary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1557 to the Present*）一書。柏群山選擇了“一種平行主題和分專題論述的方法”，<sup>②</sup>而不是按照傳統的時間順序進行敘述——他認為那樣不可能公允地看待澳門。柏群山強調了人們想像中澳門的各個方面：那裏是一處介於兩個世界之間、身處邊緣地帶和過渡轉型期並充滿回憶的地方。

採用更傳統的方法進行研究，史蒂夫·希普（Steve Shipp）於1997年出版了《澳門、中國：葡萄牙殖民地向中國治下過渡的政治史》（*Macau,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Colony's Transition to Chinese Rule*）一書。<sup>③</sup>這是一部從1557年澳門緣起到1999年回歸中國的簡史。該書讀起來更像一本典型的歷史書，面向的是廣大公眾。在附錄中，希普收入了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英文本、澳門回歸後要實行50年的《澳門基本法》英文本，以及其他文書檔案。希普認為，中國和葡萄牙對澳門的看法非常不同。雖然對中國而言“澳門回歸洗雪了國恥”，但是在中國人看來，澳門的歷史和文化意義不大，而澳門的制度和經濟活力則極為重要；但對葡萄牙來說，情況恰恰相反，澳門的歷史、文化和遺產是最重要的，其希望讓澳門回歸成為“偉大的國家成就”。<sup>④</sup>

還有一本類似的著作，是克萊夫·威利斯（Clive Willis）2002年編寫的《中國和澳門：地理大發現時代葡萄牙人與世界的相遇》（*China and Macau. Portuguese Encounters with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the Discoveries*）。<sup>⑤</sup>威利斯繼承了包括文德泉、博克塞在內眾多澳門學者的傳統，重現了歷史上的重要文獻，讓這些文獻的作者來講述澳門的故事，並作了一些簡短的注解。雖然將這些文獻譯成英文的作用很大，但本書同樣不是一本要修正或重新書寫歷史的研究著作，而不過是要進一步澄清歷史上的關鍵事件。這些懷舊出版物往往沒有真正的目標，無非是去發掘澳門這座城市的“獨特性”，對這座城市的遺產進行欣賞品鑑而已。

#### 四、澳門的微觀研究和原始史料出版

雖然對帝國史研究的興趣一直延續至今，但在20世紀80年代，人們又重新將澳門視為自身權

① R. D. Cremer (ed.),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Hong Kong: UEA Press Ltd., 1987, p. 3.

② Jonathan Porter, *Macau: The Imaginary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1557 to the Pres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 9.

③ Steve Shipp, *Macau,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Colony's Transition to Chinese Rule*,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1997.

④ Steve Shipp, *Macau,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Colony's Transition to Chinese Rule*,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1997, p. xiii.

⑤ Clive Willis (ed.), *China and Macau (Portuguese Encounters with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the Discoveries)*,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2.



利的合法主體來進行觀察審視。1987年，澳門文化學會（1989年改為澳門文化司署，現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ICM）創辦了《文化雜誌》（RC, *Review of Culture*）。該雜誌有兩個版本，中文版和葡萄牙文版。葡萄牙文版後來擴展為國際版，刊載葡萄牙文和英文雙語文章。還應注意的是，中文版和國際版的文章並不一樣。從2018年起，《文化雜誌》開始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與澳門文化局聯合出版。

1988年，澳門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創辦了《澳門研究》雜誌（JMS,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當時用中英雙語刊載有關澳門的文章。<sup>①</sup>就在第一期中，羅德里克·普塔克（Roderich Ptak）發表了〈關於明朝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地方及澳門的貿易：以西語撰寫的第二手資料文摘典籍目錄〉（“Portuguese Trade Along the China Coast and in Macau during the Ming Period: A Bibliography of Useful Secondary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一文。《澳門研究》主要關注澳門，也刊載與澳門相關的文章。當然，澳門還有許多其他的刊物，但這兩種刊物對澳門研究產生了特殊的影響，具有國際影響力。此外，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澳門文化局和其他一些機構也開始擴大涉澳圖書的出版。這項活動大部分是為了迎接1999年澳門回歸。

微觀研究一直以來都是澳門歷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這些新舉措並非這一趨勢的開端。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文德泉神父的大量著述都記載了澳門過去的方方面面。雖然他沒有利用過中國的史料，但他非常廣泛地查閱了葡萄牙文的檔案記錄，其中許多記錄今天已經不復存在。因此，20世紀80、90年代為增進澳門研究的興趣而作出的新努力，其實僅僅是對一直以來都在做的工作進行了擴展而已。

除二手史料外，原始史料的出版也得到推動。從1990年至今，大量的原始文獻已經出版。幾乎所有明清時期有關澳門的中文文獻目前都已實現出版、數位化和網上查閱，讓人人可以接觸。許多葡萄牙檔案記錄也已經出版，大量葡萄牙政府檔案目前可以在澳門檔案館的網站上查閱，並可以對人物、地點和事件進行檢索。<sup>②</sup>

近年來，澳門檔案館也獲得了大量的新藏品。這些新獲檔案沒有上網，但可以在檔案館內部查閱。澳門檔案館從果阿檔案館以及歐洲各地的一些檔案館獲得了相關檔案記錄的複件。其中許多是用葡萄牙文撰寫的，也包括其他語種的文獻。目前澳門檔案館擁有英國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和瑞典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文獻，在整個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這三家東印度公司在澳門都有活動。澳門檔案館還擁有大量法文和其他語言的檔案記錄。這些澳門的非葡萄牙文和非中文史料，現在才剛剛開始被利用起來，並被納入到澳門歷史研究的主流之中。

① 1988年6月，《澳門研究》創刊。《澳門研究》在創刊後因故停刊。1991年，東亞大學更名為澳門大學，澳門研究所也改稱為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1993年，在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澳門研究》復刊，成為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與澳門基金會共同出版的學術期刊。

② 這些原始史料包括且不限於：《明清史料庚編》第二卷，台北：中華書局影印出版，1987年；廣東省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廣州市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編：《清實錄廣東史料》，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5年；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Jin Guoping（金國平），Wu Zhiliang（吳志良），comps. *Correspondência Oficial 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Cantão e 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 Fundo das Chapas Sínicas em Português (1749-1847)*《粵澳公牘錄存》，8 vols. Macao: Fundação Macau, 2000；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古籍整理研究會編：《清宮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10卷，北京：中國書店，2002年；中山市檔案局（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如今所有已公開出來的題材和人物，都可以被列作研究的主題。除了華南地區，葡萄牙和其他地方的學者也參與進來共同努力，重新定義我們對這塊飛地的理解。目前澳門歷史研究肯定還沒有達到頂峰，因為這需要許多學者在許多不同的領域對範圍很廣的題目展開研究，在許多層面上共同推動方能達到。雖然中文、葡萄牙文和英文仍然是澳門研究的主要語言，但也已經出現法文、西班牙文、日文、德文、瑞典文和其他語言的澳門研究著作。從對人物、寺廟、教堂和機構的細微研究，到時尚、美食、運動和節日，乃至宗教、文化、經濟和政治等更廣泛的主題，研究的題材在內容上非常多樣化。這些專著和文章大多是微觀研究。除此之外，澳門還舉辦了許多學術會議，出版了大量有關澳門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會議論文集。當然，在此無法對其全部進行探討。

本文雖然不打算涉及中文的二手史料，但有一本中文著作的譯本，在澳門的歷史研究中相當有影響力。1987年，費成康出版了《澳門400年》一書。1996年，該書的英文版問世。<sup>①</sup> 費氏將澳門的歷史界定為一種葡萄牙與中國的共生關係。這種關係雖有起伏，但總體上和平共處。費氏在中文史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並利用了葡萄牙文和其他語言的史料。一些學者繼續深化這種觀點，即澳門與中國有一種特殊關係。霍啟昌（K. C. Fok）正是其中之一，他將這種關係稱之為“澳門模式”（Macao Formula）。儘管霍啟昌從未將1978年自己以“澳門模式”為題撰寫的博士論文全文發表過，但多年來他就這一主題發表了許多文章。<sup>②</sup>

20世紀90年代，澳門研究得到新的支持，相當多的中文新書和文章隨即面世。僅在1999年，就有六本關於澳門歷史的大型中文學術專著問世。但六本新書中沒有一本被翻譯成英文或葡萄牙文，而這些著作的絕大部分內容都依賴於中文史料和二手英文史料——特別是翻譯成中文的英文史料。這些著作代表着從中國人的角度重新定義澳門歷史的努力，霍啟昌和費成康或為其中的佼佼者。這些研究為後來的中國學者學習和研究澳門奠定了基礎。<sup>③</sup> 這些專著和文章的作者，以及他們的學生，至今仍然是澳門歷史研究領域中傑出的中國學者。

至於非中文出版物，也有不少英文和葡萄牙文專著面世。1996年，貢卡洛·梅斯吉德拉（Gonçalo Mesquitela）出版了自己的三卷本《澳門史》（*História de Macau*）。<sup>④</sup> 這套研究專著的內容側重於16—17世紀，對後世的內容基本沒有涉及。傑佛瑞·岡恩（Geoffrey Gunn）採用

①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Fei Chengkang, *Macao 400 Years*, Shanghai: The Publishing House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96.

② K. C. Fok, “The Macao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 Ph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8; K. C. Fok, “The Ming Debate on how to Accommodate the Portugues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acao Formula,” *Review of Culture*, Vol. 13/14 (January/June 1991), pp. 328-344.

③ 20世紀90年代籌備澳門回歸期間，有一些中文著作出版。如黃啟臣、鄭煒明：《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黃啟臣、鄧開頌編：《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蔡鴻生主編：《澳門史與中西交通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鄧開頌、吳志良、陸曉敏主編：《粵澳關係史》，北京：中國書店，1999年；吳志良：《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黃鴻釗：《澳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章文欽：《澳門歷史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

④ Gonçalo Mesquitela, *História de Macau*, 3 vols,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6.

更為全球化的視角，於1996年出版了《澳門史1557—1999》（*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一書。該書將澳門與其他現代亞洲經濟體如新加坡、韓國、香港和台灣地區進行了比較。岡恩指出：“時代的興衰變遷，給澳門的歷史和建築遺產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既留在了頹敗的現場，也留在了人們的記憶裏。”<sup>①</sup>因此，該書力圖要填補這一鴻溝。基於比較的歷史分析，岡恩認為澳門有着“高標準的民主制度、人權、勞動立法以及人的尊嚴感。當時間進入葡萄牙人管理的最後幾年的時候，澳門已經有了一個令人羨慕的經濟基礎，一個比例越來越大的中產階級，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都市上層階級，以及一個穩定的基礎結構，能夠着手把這一地區打造成珠江三角洲中心的一個關鍵性的金融和資訊節點”。<sup>②</sup>但是，岡恩並不認為所有這些活動都必然是積極的。他指出，追逐金錢利益（對“財神爺”的崇拜）乃是21世紀之交這塊飛地所面臨的最大威脅。<sup>③</sup>

20世紀80和90年代，還有幾本研究澳門貿易的新書問世。喬治·布萊恩·蘇薩（George Bryan Souza）1986年出版的專著題為《帝國求存：1630—1754年間在中國及南中國海的葡人貿易和社會》（*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該書構建起澳門經濟政治史的基礎。蘇薩追隨着博克塞的腳步，他將自己的書視作“對歐洲擴張史研究中一個特定領域的貢獻”。<sup>④</sup>蘇薩無法利用中文史料，但非中文的史料裏卻包含有關澳門貿易與經濟的最佳細節和資訊。因此，這些遺漏沒有對其研究結果產生重大的影響。該書依然是對葡萄牙貿易和管理當局在亞洲整個相關時期如何運作的最佳和全面研究之一。蘇薩廣泛運用史料，史料語種包括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荷蘭文和英文。該書問世時間在費成康的書出版之前，所以蘇薩無法參考費成康的著作，也無法將中方的觀點納入到自己的探討當中。但是該書極大地擴展了博克塞早期的工作，揭示出澳門商人如何讓“他們的經濟能力與現實中的政治地位”相適應，<sup>⑤</sup>例如進入新市場、引進新型的商業授權許可（寄售）方法，以便維持自己的長期存在。

1987年，潘日明（Benjamin Pires）出版了《16至19世紀澳門至馬尼拉的商業航線》（*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XVI a XIX*）一書。隨後1993年他又出版了一本《18世紀澳門的海上活動》（*A Vida Marítima de Macau no Século XVIII*）。<sup>⑥</sup>1996年，奎馬拉斯（Ângela Guimarães）出版專著《一種特殊關係：澳門與葡中關係（1780—1844）》（*Uma*

① Geoffrey C. Gunn,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96, p. 2.

② Geoffrey C. Gunn,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96, p. 187.

③ Geoffrey C. Gunn,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96, p. 3.

④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xix.

⑤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25.

⑥ Benjamim Videira Pires S. J.,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XVI a XIX*, Macao: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7; Benjamim Videira Pires S. J., *A Vida Marítima de Macau no Século XVIII*, Macao: Cultural Institute, 1993.



*Relação Especial: Macau e 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1780-1844*)。<sup>①</sup> 1997年，瓦爾 (Martins do Vale) 的《葡萄牙人在澳門 (1750-1800)》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一書問世。<sup>②</sup> 數年之後，張廷茂於2004年用中文出版了《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史》。<sup>③</sup> 在所有這些研究澳門貿易和經濟的著作出版之前，我們對澳門葡萄牙人在亞洲貿易中的參與程度只有模糊的瞭解。但是現在借助這些新的資料，我們對澳門的海外貿易活動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塞亞布拉 (Leonor Diaz de Seabra) 的著作同樣增進了我們在澳門對外關係方面的理解。2005年，她出版了《施基拿使團出使暹羅 (1684-1686)》 (*The Embassy of Pero Vaz de Siqueira to Siam (1684-1686)*) 一書。<sup>④</sup> “澳門—菲律賓歷史關係研討會” (Conference of Macao-Philippines Historical Relations) 論文集同樣於2005年問世。2011年，塞亞布拉出版了又一本大部頭專著，題為《澳門的慈善事業 (16-19世紀)》 (*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Séculos XVI a XIX)*)。這些著作討論了宗教、政治和經濟問題，所有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為其添磚加瓦。

現在每年都有大量研究專著出版，幾乎不可能跟得上出版的步伐。試圖包舉全部研究注定徒勞，本文不管列舉多少位作者，肯定會掛一漏萬。過去二十年中，用英文或葡萄牙文出版和刊發過澳門研究專著及文章的部分學者包括：普塔克、洛瑞羅 (Rui Manuel Loureiro)、吳志良、金國平、阿爾維斯 (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伊詩迪 (Maria Antónia Nicolau Espadinha)、薩安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巴雷多 (Luís Filipe Barreto)、阿蘭·諾曼·巴克斯特 (Alan Norman Baxter)、加斯帕·羅德里格斯 (Vitor Luis Gaspar Rodrigues)、莫爾塔·皮娜 (Isabel A. Murta Pina)、艾薩·貝拉爾瓦 (Elsa Penalva)、伊莎貝爾·莫萊斯 (Isabel Morais)、錢江 (James Chin)、高埃麗 (Elisabetta Colla)、羅熱里奧·普加 (Rogério Puga)、盧西奧·德·蘇薩 (Lúcio de Souza)、凱薩琳·克萊頓 (Cathryn Clayton)、瑞思·科雷亞 (Pedro Lage Reis Correia)、林玉鳳 (Agnes Lam)、烏戈·巴爾迪尼 (Ugo Baldini)、日諒 (Alfredo Gomes Dias)、白蒂 (Patrizia Carioti)、露西·柯恩 (Lucy M. Cohen)、維阿拉達 (Iêda Siqueira Wiarda)、保羅·B·斯普納 (Paul B. Spooner)、何偉傑 (Vincent Ho)、伊沃·卡內羅·德·蘇薩 (Ivo Carneiro de Sousa)、董少新、白雅詩 (Beatriz Puente Ballesteros)、郝志東、鄭妙冰 (Christina Mui Bing Cheng)、大衛·布魯克肖 (David Brookshaw)、阿馬羅 (Ana Maria Amaro)、冼麗莎 (Tereza Sena)、史華羅 (Paolo Santangelo)、魏楚雄 (George Wei) 及若昂·保羅·奧利維拉·科斯塔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等等。還有其他許多學者用非中文的語言從事有關澳門的研究，恕無法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在此謹致歉意。

① A.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Macao: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7.

② Ângela Guimarães, *Uma Relação Especial: Macau e 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1780-1844*, Lisbon: Edição Cies, 1996; 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Macao: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7.

③ 張廷茂：《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史》，澳門：澳亞週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④ Leonor de Seabra, *The Embassy of Pero Vaz de Siqueira to Siam (1684-1686)*, Macao: University of Macau, 2005; Leonor de Seabra, *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Séculos XVI a XIX)*, Macao: University of Macau, 2011; Alan Norman Baxter, Maria Antónia Espadinha and Leonor Diaz de Seabra (eds.), *Conference of Macao-Philippines Historical Relations*, Macao: University of Macau and CEPESA, 2005.



## 結語：前進的道路

20世紀70年代，研究澳門的學者大概只有十幾人。而現在，出版刊發澳門研究專著和研究文章的人已經數以百計，且每年都有更多的作者加入到這一領域當中。對於初涉這一領域的學者來說，不但瀏覽這些文獻著述的任務艱巨，而且要時刻跟上即將面世的新研究，同樣具有挑戰性。要有效地進行研究，目前至少需要掌握三種語言：中文、葡萄牙文和英文。

研究者的群體如此龐大，使之不可能讓所有學者都集中在同一領域。目前進行的大量研究要求學者們更加細緻地關注其特定領域，包括宗教、社會、經濟、政治、教育、環境等等。與此同時，有必要在各個領域之間進行互動、相互學習。同樣重要的是應該認識到，將所有要素結合起來探討，始終是對總體歷史研究的要求。就現階段而言，將這一領域向前推進，最需要的還是繼續擴大微觀研究。

學者們希望能更好地獲取史料，樂於看到新資料的刊佈。我們繼續鼓勵檔案工作者以印刷和線上的形式讓更多的檔案文獻重見天日，這對我們的研究至關重要。但就學者而言，進行新的研究應自有其原因目的。如果一項課題除提供新的材料之外沒有更廣泛的意義或應用，我們所做的便只是檔案整理的工作，而沒有將這一領域向前推進。將微觀分析做出重大意義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就澳門內外的人、地點和政策進行比較研究。儘管許多微觀研究已經做完，或正在進行中，但其往往沒有建立更廣泛的聯繫。僅僅刊佈新資料是不夠的，還需要有一種使命感，來讓這些新資料的刊佈出版具有意義。

由於語言的障礙以及緊跟當前研究的困難，現在也出現了重複研究的傾向。即研究不是建立在前人的肩膀之上，而是重複已經做過的研究。此外，還有些著作只是對從前用其他語言撰寫的研究專著進行簡單翻譯和再版，對原作者沒有予以適當的尊重。部分研究澳門史的學者繼續重複以往的研究，不顧其他人已經從事過相關研究，貿然出版著作和刊發文章。

因此，雖然筆者對圍繞澳門每年都繼續出現大量新的研究表示讚賞，但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在從初涉該領域的學者到該領域的資深學者的各個層面上加強監督。

[責任編輯 陳超敏]